



《书屋》编辑部◎编

书生未敢忘忧国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家国情怀，总是在从事专业之余介入对社会公共话题，如社会公平、人文精神、政治体制改革、教育改革、城乡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引领大众、启蒙社会的使命感。

湖南教育出版社

八第
● 說
生利分利
● 說
二十五
以
正
本
公
共
利
益
本
書
主
要
內
容
是
關
於
生
利
分
利
的
論
述
本
書
主
要
內
容
是
關
於
生
利
分
利
的
論
述
本
書
主
要
內
容
是
關
於
生
利
分
利
的
論
述



《书屋》编辑部◎编

书生未敢忘忧国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家国情怀，
总是在从事专业之余介入对社会公共话
题，如社会公平、
人文精神、政治体制改革、教育改革、
城乡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引领大
众、启蒙社会的使命感。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生未敢忘忧国/《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49-6

I. ①书… II. ①书… III. ①社会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D6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7637号

书生未敢忘忧国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刘文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7 字数: 1766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49-6

定价: 36.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代著名爱国者林则徐的这句名言，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执著追求。

受儒家文化之熏陶，从春秋战国开始，几千年来，无论在朝在野、显达贫穷，总有正直的士大夫超越一己之利害，以明辨是非的勇气就国家兴衰、政策得失等问题直陈己见，以养天地之正气，匡王政之不逮，形成一种悠远的“以道制势”的文化传统。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屈原、贾谊、杜甫、范仲淹、左宗棠、林则徐等，他们的道德文章、生平行谊都产生了感动当世、激励来者的巨大作用。尽管历史的真相往往是“以势制道”甚至“以势为道”，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命运多舛，抑郁而终，但那种道统意识一旦形成便绵延不绝，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更是顽强地表现出来。



传统士大夫的道统意识在现代社会转换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和批评精神。相对于传统士大夫的依附性,现代知识分子更具独立意识,对世俗权力的授予和行使、内容与边界,都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加以判断和认知。但全新的知识谱系仍注入了传统的血脉和精神。中国近代以来以梁启超、鲁迅、胡适、殷海光、顾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输入新知、再造文明的努力中,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成长期。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纷纷起来议论国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期间产生的一批著名刊物如《新青年》、《独立评论》、《观察》、《大公报》等,皆以其独立的姿态、世界的眼光、雄健的笔仗和犀利的批评,展示了那时书生论政、言论蔚起的时代风貌,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发扬得淋漓尽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之思潮的流行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相当一部分文人将视野退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通过官学结合、商学勾结谋取金钱、名位等眼前利益,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对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听之任之,甚至为之推波助澜,知识界弥漫着一种及时行乐的犬儒主义氛围。一时间,“启蒙”成了一个敏感而尴尬的词汇,“批评”更被视为不合时宜和迂腐顽直。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秉承良知和道义,利用已有的空间和条件,就历史和现实问题发舒己见,引导和启示知识界和其他各阶层人士明断是非,矫正时弊。他们的努力,终将会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尊敬。

中国的现代历史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有眼光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个回归常识、尊重常识的过程。中



国人曾经因为受制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建构理性,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干过不少违背常识、违背世界潮流的事情。由此酿成的悲剧让知识分子们痛定思痛,深感站在常识的立场思考和行动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无论作为客观知识方面的常识,还是作为主观价值方面的常识,多数国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丰富拓展的任务。要避免重蹈“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扭曲,关键仍在于继承和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示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扫除迷信、巫术、野蛮、专制等一切反逻辑、反文明的思维习惯和社会陋习。中国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常识域”。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已推行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但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官本位和权力越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和遏制。一方面是权力监督不力,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的涌流,权力和资本的不当结合,造成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外打着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旗号,寻求国家政策保护,对内又以“国际惯例”、“中国特色”等为由盘剥消费者,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分配不公。对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多数人的“被剥夺感”。由此蓄积的内心怨愤和不平一旦爆发,将会引发严重的阶层分裂和社会危机。为此,他们持之以恒地呼唤公民社会,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上层和民间的力量制约利益集团的跋扈和扩张,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推进“还权于民”。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如下共识:没有政治体制改制的及时跟进,经济领域改革的成果亦可能得而复失。

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来都不能缺少知识分子的仗义执言和严肃批



评。这是一个被人类文明史所反复验证的事实。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当在以理性、严肃、负责任的态度就社会公共话题开展讨论和批评,以促进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同时传播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和文明理念,在中西交流、古今融合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胡长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尊重经验 回到常识

- 001 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
- 004 常识的立场
- 011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第二章 弘扬理性 呼唤公民

- 029 也谈“启蒙”
- 037 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
- 063 观念的进化:由人民到公民
- 068 再论人民与公民
- 071 我的“公民”观

第三章 人文精神 魂兮归来

- 081 人文知识和文学的意义
- 088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 102 作家的根在哪里?

——从对《如焉》的讨论谈起



115 传奇年代的“终结”

第四章 牢记昨日 以史为镜

131 革命成功之后
——有关点点《点点记忆》的点滴

146 历史和现实的交战

169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

177 怎一句“人性卑微”了得！

第五章 改革之路 任重道远

193 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206 解放农民

217 小书中的大问题

——读秦晖《农民中国》和《传统十论》

226 中国道路：二十世纪的两次选择

——《西方民主史》再版前言

233 民主：内生与借鉴

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

前段时间听好几个朋友说起，书摊上有本叫《黄金时代》的书，很好看。于是也凑热闹地买了一本。书在家里搁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看电视看到荧屏一片雪花，才漫不经心地翻起《黄金时代》。原本是为了催眠，想不到翻了才两页，却让我精神起来——真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按说这故事说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也就是吃饭睡觉、饮食男女一类，在别人笔下会挺艰辛挺坎坷的故事，在这儿都家常的很。但家常其实最不易了，那个年代的人，又是写那个年代的事，能保持生活常识，而且以常识去判断大是大非，几乎见不到。我对作者开始佩服起来：真是有原则的人！过去的年代，讲起原则都是些很大的东西，这东西因为太大，弄到把日常生活都淹没了，把人性真相都阉割了。前几年听人讲哈贝马斯，才知道这



叫“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们的生活被空洞的原则侵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殖民了。其实越大，越是根本的东西，就越平易才是，无论哪一类原则都该是极平易、人人看得懂的东西。《黄金时代》的故事里，就都是这样的原则。

这还得感谢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在此之前，这些道理我们还不懂得，即使读到、听到，也会不以为然。那时候喜欢想大事，谈高深的理论，说与民族命运有关的使命感之类的话。尽管197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以撕破“神圣”为基本内容的，但不知道怎么搞的，马上有很多新的神圣取而代之，人性还是被遮蔽的。在被遮蔽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概念和理论，能够激动你的，也都是一些大事件和大概念。而且因为个人永远无法对这些大东西负什么责任，所以也就没什么责任可尽了。一切的一切，总可以推诿于某个系统，某个运动，甚至推给中国历史。这其实是一种很轻松的活法，因为所有让你感到沉重的东西都是你无法负责任的东西。当然这里也有着最大的悲哀，这代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那种纯粹个人的、无须依赖于外界的快乐。

《黄金时代》的主人公是有这种快乐的，而且他的快乐都是这一类无须依赖于外界的。他也有很多责任要负，他其实活得挺累，没什么精神庇护所可以让他去躲，他也从不向社会推卸他的倒霉。他有常识，凭着常识，他在倒霉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开心。我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是的话真了不起。那年头漏网之鱼不多，能不被系统毒害，省得到这几年再重新学习常识，还常常因为被遮蔽久了学不会。我这不是瞎说，恢复常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需要脱胎换骨，最起码要一



代人的艰巨努力。

《黄金时代》的作者叫王小波，一位英年早逝的作家。

顺便说说，这篇东西的文字极好，白得不能再白的话了，一气读下来竟有一种读诗的感觉。

(搏 非 文，原载《书屋》1996 年第 5 期)



常识的立场

中国当代思潮的流行和转移，常常是缘于一些专家学者对西方各种时髦学说的宣扬。与二十多年前无书可读的情形相比，时下的知识多得目不暇接，而且转瞬就已过时，令人感到知识的不能承受之重。知识一旦成为信息，就如同自然山水变成了旅游景点，看到的不再是风景，而是络绎不绝的游人和垃圾。因此现在出了一个王小波，沉静地守着某种知识，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资本，这使人们趋时的心感到了某种清新。

王小波的力量在于他拥有一个常识的立场。渊博的学者指出他的思想来自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对的，但他的文字更像是表达了一些常识，而不是某种主义。在本质上他不是个诗人而是个小说家，这可以从他不唱高调，比如厌谈崇高或激情之类中发现。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对

于时下的一些理论和主张,他都把它纳入常识的范畴中来观察,这使得他的随笔具有一种简洁明白的效果。所谓常识,不过就是明白日常事理的能力,顺任自然和习俗,大至民族阅历,小至个人经历,都可以拿来作思想的参照。人类精神的成长,其实是很缓慢的,根本的东西就那么一些,例如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等。现代人弄出许多博大精深的学说,实质上并没有给人类精神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何况先哲的言论原本也都是出自常识,只是后来由于文化的积淀,它们才变成了知识权威。所以面对复杂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学说,往往倒是平常的心智来得可靠。王小波喜欢在书中叙述许多个人故事,就因为倘若离开了寻常经验和常识的描述,任何学说都可能成为谎言。

服从常识往往能使人通情达理,因为它总是直接洞悉事物的真实。鲁迅先生说过:“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常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直接的方式,其精髓在于自然,而一个不能靠常识作出判断的人,俗的说法是没头脑。在王小波眼里,他的姥姥是个有头脑的人,她在“大跃进”时期不相信一亩地会产三十万斤粮食,因为这不符合自然。尤其她还是一个普通人,面临没有饭吃的问题,因此她的常识中还包含着利害的成分,而懂得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懂得事理,已经没有饭吃还说形势大好,就不是承认事理,而是顺从思想。其实常识正是思想的底子,王小波明白这一点,对于应不应抢救被洪水冲走的国家财产,他认为首先应问问值不值得,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是通情达理,也是真实不欺。

服从常识还意味着使用简洁明白的话语,让思想的表达举重若轻。朴素的语言也能说出真理,而且说得更好。这方面,古今中外那些真正的



思想家、文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的文章总是明白晓畅,容易与人沟通。如果一个明白的道理,却非要表达得很复杂,做出很有学识很有思想的样子,其结果往往显得举轻若重。王小波曾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在常识领域中他十分聪明,而且有趣,但他偏想要有思想,说点那个时代的时髦话语,结果很闹了些笑话。那个队长恰恰忘记了,一句蕴含着生活经验的话语也许比任何迷人的理论都更有价值。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失去常识的年代,“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是全民对常识的恢复,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小岗村村民的大包干,其实全都是常识。后代的人将不会明白,这样的言行当初竟然能使全民激动不已,他们更不会明白,为了这些常识中国人曾付出了几十年的苦难代价。我们的社会不缺乏理论,缺乏的是常识,像王小波姥姥那样的常识。任何伟大的思想并不比一个老农的看法对人们更有益。如最近的报纸所透露的,五十年代末的科学家们还曾接到最高指示,开展“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研课题,要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化成有机化工原料,而当时的现状早已是哀鸿遍野了。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于寻求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理论,用某种思想或主义来对现实进行解释,而不管生活本身是不是这样。

这里奉行的是格勒定律:如果事实与理论不一致,这事实就必须被抹去。

造成二十世纪灾难的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仍在延续,看不出有多少改变。许多人不明事理,却喜欢高谈思想,谈学说。比如,二十几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悲剧,一代人的读书、工作和婚姻都被耽搁了,如今他们中大多数人又面临着下岗,承受着家庭的重负,但有些人却

以一种精神被虐狂的心理宣称“青春无悔”。据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然而,什么时候黄土高坡变成了鲜花盛开的原野?辩证的理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人们痛苦的经历?对于当前的集体腐败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一面是有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资产,一面是让严肃的思考脱离现实的轨道,而无论是理论界提倡给改革引入人文关怀,还是认为腐败是由于过去制度难以为继的体现,其实都是言不及义,因为它们都没有指出权力体系导致腐败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正是由于造成过去灾难的那种权力关系仍在起着作用,在权力的制约方面并没有质的改变,腐败才得以大量产生,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具有现代特征的腐败其实从“文革”后期利用权力关系“走后门”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稍有一点常识和记忆就可以弄明白的。但许多人不能明白,很多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让判断停留在常识中就行了,如果不具备真诚与思考的素质,追求理论的结果往往会败坏人们的正常理解力。

思想出于持续的恐惧,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经验的核心。在王小波的思想背景中总有着过去年代的威胁,他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他对事物的理解,大多也是对着那个年代而发,告诉人们不要相信什么,而不是有些人总喜欢叫人们相信什么,所以他的常识是一种“反思的常识”。他所反对的,都是过去几十年的东西,以及从过去延续下来的那部分现在。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所反对的物欲横流,他并不特别关注,他关注的是过去年代幽灵的复活,那些试图改造人们思想的倾向,还有信仰的滥用,比如九十年代中期“重建精神家园”、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等等。的确,与过去的“突出政治”、“反帝反修”相比,当代的精神迷恋实难说取得了多少历史进步。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后,仍然有人



对全民的世界观感兴趣,这恰好说明,只要过去的许多事情没有说清楚,没有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任何历史就都是当代史。

这似乎是八十年代启蒙的主题,其实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基本问题,不应该越过这个基本问题去探讨理论,否则就是对着风车挥舞旗帜。非洲饥民、前南地区、高加索当然是人类的悲剧,西方社会物质主义的危机我们也从小就被告知,但这些都不是属于相同社会的同一层次的问题,人们无法对某一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保持恒久的关心,因为这是人的能力所限。且不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缺乏常识(如认为他们不重视家庭生活)一如西方知识分子曾经对我们的看法缺乏常识一样(如有的西方学者就曾把我们的自我批评看成是一个美好社会纯洁心灵的体现),但西方知识分子毕竟是出于对自身境遇的反抗,可我们则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才更加迫切,倒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然而,在每天大量制造的文字中,我们却绝口不谈那些真正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真正所在,这些问题,即使没有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的写作,也早已是人们私下谈论的常识了。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南非作家戈迪默所说的那种“基本姿态”,即真实面对自己生存的境遇,并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它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终极目的的关怀掩盖不住他们对基本问题的逃避。人们的目力所及之处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操着同一种言说方式,例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一大堆时髦空洞的词语,荒诞、焦虑、忧患、颠覆、建构、预设等等,九十年代以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报刊文章腔,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些二三流中外教授学者制